

26.01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兰州党史资料汇集

(二)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甘肃工委兰州黄家园豆浆店联络点概况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 ）

三十年代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始末记

.....兰州市政协（ 8 ）

抗日战争时期的兰州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

.....杨静仁（ 24 ）

我所知道的甘肃青年抗战团

.....罗杨实（ 30 ）

忆兰州生活书店

.....薛迪畅（ 41 ）

传播革命火种的“兰州派报社”

.....郑得堃（ 51 ）

甘肃工委兰州黄家园豆浆店

联络点概况

(初稿)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黄家园豆浆店作为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的一个秘密活动联络点，由赵子明同志负责，为甘肃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形势的发展促使国民党停止内战，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谢觉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以党代表身份由延安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在谢老来兰的同时，党派孙作宾同志也来到兰州担任甘肃工委书记主持工委的工作。当时，赵子明同志做工委事务性的工作，为了掌握情况，开展工作，孙作宾找王子勤了解兰州有无地下党等情况。因赵子明和王子勤在这以前就认识，王便把赵在宁夏的情况介绍给孙作宾。同年八月中旬，孙作宾同赵子明一起去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老接见了赵子明，并对他说：“你对兰州熟悉，认识的人多，接触社会面广，这对我们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很有利。今后你可在孙作宾同志领

导下以黄家园豆浆店为掩护。上午经营豆浆，下午可以抽出时间为党工作”。赵子明当即向谢老表示：“今后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从此，黄家园豆浆店便成为甘肃地下工作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赵子明便在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一九三八年春，党派罗云鹏同志来甘肃工委工作。一天，罗云鹏同志来到黄家园豆浆店找赵子明谈话，传达了工委的决定，罗云鹏说：“工委决定：你为工委事务秘书，你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外地来兰工作的同志解决住宿、介绍社会职业、邮寄包裹、汇款、负责开会通知、印刷文件和进步材料、传递消息等”。那时，每天来豆浆店的人较多，其中有进步青年和学生，有革命的同情者，也有国民党士兵、官员和太太。赵子明便用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逐渐认识了许多人，并了解和掌握了有些人的情况。一九三八年三月，罗云鹏同志同樊桂英同志结婚，赵子明在黄家园为他们俩找到了住房，此房离豆浆店很近，为了掩护身份，他们对外互称亲戚关系，罗云鹏称赵子明为姐夫，李桂庭（赵子明之妻）称罗云鹏为大弟弟，由于罗云鹏住房小，工委召集的有些会议曾在豆浆店召开。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央指示地下党组织要由城市转入乡村，罗云鹏同志和樊桂英同志以甘肃工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天水工作。此后不久，孙作宾同志调离兰州，工委指示罗云鹏、樊桂英二同志又从天水回到兰州。赵子明又介绍罗云鹏夫妇住在周家庄五号席维汉家中。这样黄家园和周家庄两处先后就成为甘肃工委的秘密机关。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党派李铁轮来甘肃接任孙作宾的工作，为有一个“合法”身份掩护其工作，由赵子明出面联系，并同新疆地下党派来的王立民同志一起，利用给兰新公路建筑公司投资二千元伪币之机，给李铁轮同志在河

口找到了工作，他公开的职业是兰新公路建筑公司会计。

为了发展组织，壮大力量，赵子明考察了豆浆店工人中曹汉祥和李自林，并经常启发和开导他们。一九三七年初，赵子明和李自林在一次谈话中，李说：“现在是抗日时期，只要蒋介石一声命令，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就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赵说：

“杨虎城、张学良把蒋介石扣起来主要是蒋不打日本，搞内战。”

李问：“他不打谁打呢？”赵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救国救人民的。”李说：“我当八路军去抗日。”赵说：“不当八路军

在后方也可以抗日，没有巩固的后方，前方谁支援呢？”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一天，赵子明又找曹汉祥谈话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

穷嘛？”曹说：“这是我的命不好。”赵子明说：“那不是你的命不好，是地主压迫剥削你。”并问曹：“你们家乡过红军吗？红军好不好？”“过过，红军当然好，吃老百姓的东西首先要付钱，比国民党军队好得多。”“你想当共产党吗？”“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共产党是专门领导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曹汉祥、李自林二同志经过赵子明的启发和组织的培养教育，成长为党的地下党员。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李铁轮同志在周家庄被捕后，李在河口的住处有党的文件和全省党员名单。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曹汉祥同志受郑重远、王实先委托，只身前往河口李铁轮同志住处寻取文件和党员名单，他到河口找见了工地的负责人说：“李铁轮城里有事，他让我来他家取点东西”，曹在李的住处找到了小皮箱后，从里面找到了两份油印文件，便在附近烧毁了，但没有找见党员名单。回来后，郑重远、王实先又指示他再去河口寻找，结果第二次去后又没找到。午后，曹汉祥同郑重远、王实先二人又去兰新公路崔家崖工地（此处系放工具处，李铁轮曾在这里住过）。郑重远是兰州市榆中县金家崖

人，认识人多，他怕人发现，便在外面了解情况，看动静，王实先和曹汉祥进去后对看门的人说：“鲁平要生孩子，她让我们来取催生药”。他俩进去后很快找到了皮箱，此时，天已黑了，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们三人由崔家崖沿黄河划着羊皮筏子向东驰去，在卧桥上岸，进水北门，然后进城，皮箱便由王实先同志带走。

赵子明同志在担任甘肃工委事务秘书期间，还专门负责印刷文件和进步材料。工委的一部石印机，两部油印机就曾秘密藏放在豆浆店后面的一间小库房里，用豆子和一些东西掩盖起来（石印机后转入上西园圣母宫庙内）。印刷文件时，赵子明同志和李桂庭同志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进行工作，此间，赵子明同志学会掌握了盘炉灶技术，目的是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将材料和文件全部放进火炉化为灰烬。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两部油印机又转入周家庄罗云鹏住处，同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工委指示赵子明同志转移，赵又将油印机和一些进步书刊藏在旧煤油箱内，由毛驴驮往黄河沿（今河水道），在曹汉祥的协助下，用羊皮筏子运往河北盐场堡党外人士孙耀先家中保存。一九四〇年六月，孙悉赵被捕的消息后，即将延安解放和苏联外文局出版的书在夜间投入黄河，一九四五年春，伪中统特务机关派青年特务韦刚去孙开办的“国光针织合作社”伪装学徒，侦察孙是否和共产党有联系，孙知道后怕特务抄家，就将剩余书刊和油印机全部烧毁。

一九三八年，兰州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豆浆店虽然没有被炸弹炸毁，但窗户被震烂，电灯被震碎，顶棚也塌下来了，为了尽快修复恢复工作，赵子明有意用《新华日报》裱糊顶棚。那时，《新华日报》积极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在群众中有很大大影

响。一天，《西北日报》编辑张文英来喝豆浆，他看见顶棚上的《新华日报》，便责问赵子明：“卖豆浆的，你为什么用《新华日报》糊顶棚？我看，你是有意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由于张文英的监视威逼，第三天，赵子明使用石膏粉水粉刷了报纸。后来，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国共合作颇于破裂，形势一天比一天坏，兰州被国民党封锁的更加严密。西北调统室派出特务在兰州到处活动，地下工作处于非常时期，面临的困难很多，在恶劣的环境中，豆浆店和甘肃地下党始终保持着联系，地下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中央对省委的重要指示、文件，有些通过其它渠道传下来，有些则通过“八办”，然后由“八办”交通来豆浆店以喝豆浆为名，把文件和指示秘密带来，赵子明和曹汉祥以及李自林再把这些指示、文件及时送给工委。一次，党中央给甘肃地下党送来很多进步书籍，其中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党史》等等，工委指示由赵子明将书送八路军办事处秘密运出来，赵子明使用给“八办”送豆浆为名，回来时将书装入旧煤油箱内挑往豆浆店，然后送给省工委。

为了支援抗战，赵子明让曹汉祥去周围向群众做募捐工作，并组织了一次“义卖”活动，不几天《抗敌报》刊登了募捐和义卖的消息。丛德滋同志创办的“民众通讯社”刊物，刊登了李桂庭募捐的消息并贴在道升巷白墙壁上，向群众进行宣传。谢老知道后，指示工委说：“今后豆浆店对外活动不宜搞得过多，否则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对我们地下工作不利”。

抗战期间，兰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受党的影响，向往革命，纷纷要求去延安学习。他们通过工委批准，有的由工委接济路费去延安；有的是自筹路费；还有一些失散在河西走廊的四方面军的同志。这些进步青年和四方面军的同志由赵子明同志负责办理车票，

送往延安的约有一百多人。此外，豆浆店还利用晚上时间办识字班，组织工人和周围群众学习文化，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使原来不识字的一些同志也学会了记笔记。

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工委遭到敌人破坏，豆浆店也被迫停止工作，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樊桂英、赵子明等同志相继被捕，关押在沈家坡看守所，由于看守所克扣公粮，伙食极劣，李桂庭同志便利用探望赵子明的机会给狱中的同志送饭、送衣物。狱中的同志又用李桂庭这个特殊身份（李又通过王泽喜同志，王系农民党员）和甘肃工委的郑重远、王实先、罗杨实取得联系，郑、王、罗又通过王泽喜，赵珊同志将狱中的情况送往八路军办事处；“八办”和工委又通过这个关系将党的指示带进看守所。狱中的同志在罗云鹏同志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赵子明被捕是因为给罗云鹏夫妇在周家庄找到住房而受到牵连。敌人捕赵时，赵不在，就将其儿子抓走，关进畅家巷伪警察局第六分局，赵怕儿子年幼，说出重要情况，便自己主动投案换出了其儿子。曹汉祥因身份有所暴露，于一九四〇年七月离开兰州奔赴延安。在这以前，李自林因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曾于一九三八年冬回到原籍静宁县以一百元卖了壮丁在国民党第一军167师500团卫生队当担架兵。一九三九年六、七月开小差离开担架队回到家乡种地。同年底，又来到兰州黄家园豆浆店协助赵子明、李桂庭卖豆浆，搞地下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因赵子明越狱，特务无法追捕，伪警察局将李自林抓去吊打一天。由于李始终未暴露情况，当天被释放。随后他便离开豆浆店在兰州以卖水维生。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家乡静宁当保丁七、八个月，主要任务是摊派老百姓粮草，后来保长伊恩生派他去抓壮丁，他不干，便又在家里种地。此间，他失掉组织

关系。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李又由静宁来到兰州，一九五〇年六月经赵子明证明，市委组织部批准恢复了李的党籍，在市委招待所工作。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底在兰州市民政局残废教养院工作，一九七五年初病逝。

（一九八二年九月）

三十年代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

始末记

(初稿)

兰州市政协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推进。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举国上下，面对丧权辱国、领土沦陷的严重局面，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浪潮遍及全国。而卖国贼蒋介石置全国人民的呼声于不顾，继续集中兵力大打内战，公开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步步与日寇妥协。全国人民看透了蒋介石反动、独裁、卖国的反革命本质，掀起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反蒋爱国斗争。

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同仁”），就是在这个浪潮中诞生的。她以传播新文化出售进步书籍开始，广泛吸收各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入社，参加各种抗日爱国团体和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兰州市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为促进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还有三十多名社员奔赴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参加了革命和入了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部分同志已经献出了宝贵生命，一部分同志已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一、“同仁”创始人王彦升

“同仁”的发起人王彦升是山西介休县田堡村人。其父王佩

铭（原名王希光）民国初年进入北平定居，后被聘为甘肃河州镇守使裴建准的秘书。王彦升于一九一五年生于北平，一九二二年下半年随父到甘肃临夏，读过私塾，上过军民小学，教会小学，一九二七年毕业于临夏凤林高级小学，升临夏初中后，因临夏回民暴动而辍学，全家迁来兰州定居。王来兰后曾在兰州电灯电话局（现省府东面）当学徒，兰州制造局（萃英门内）当勤务。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进入当时甘肃农工银行（现中央广场邮局南侧，后改为兰州平市官钱局）当练习生、助理员，一九三五年三月底辞职，专门经营“同仁”。

王彦升喜爱读书，他在平市官钱局工作期间，就开始阅读邹韬奋同志办的《生活周刊》，从而懂得不少新鲜知识。一九三二年《生活周刊》社改为上海“生活书店”，开始出版多种大型期刊，出版数百种图书。王彦升即用在银行工作的收入，大量予以函购，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报杂志，使他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王彦升不仅自己阅读进步书籍，而且还向银行同事和附近电报局、邮局的职工介绍，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后来找他代购和阅读书报的人日渐增多，他即向“生活书店”函购转销。因此“生活书店”批发科邵公文同志（现在北京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就写信鼓励他，“不仅自读还要广泛宣传、推广，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新书”。于是王函购数量日渐增多并按银行经理马蔚奇的指点，将来书利用工余时间在银行门口销售。后又搬到银行后面的黄家园一个关帝庙（当时人叫康喇嘛庙，因庙内住一个姓康的喇嘛主持庙务）出售，庙内地方很大，只挂了甘肃和皋兰县农会两个单位的空牌子，三间庙门，两侧两间可作铺面利用，通过交涉选要了一间，这就为他利用业余时间和星期天开门营业创造了条件。当时

由于资金的限制，各种进步书报杂志数量很少，但仍然吸引着日益众多的具有爱国抗日进步人们炽热的心！于是，王彦升就考虑着进一步扩大书籍经营的路子。

二、“同仁”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

王彦升了解到上海“生活书店”对内也称为“生活出版合作社”，职工都是社员，管理机构是社员选出的理事会，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职工们都能奋发工作，不计报酬，同甘共苦，愿为文化事业努力，从而得到启示，决心仿照“生活书店”做法创办合作事业，出售进步书籍，满足群众的要求。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由王彦升、万良才、陈立生、何玉轩、陆春浦、廖子厚、李慎修、王永年、李辑五、李甲中、单玉麟等十二个经常阅读宣传进步书刊、热心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根据王彦升的提议决定：成立“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简称同仁合作社）。初步决定：社员入社必须缴纳四元以上股金，社员购书一律以九五折优待，社员退社必须在三个月前提出申请，经同意后除退本钱外，还付一定利息，或叫“分红利”，并赠送书籍刊物。决定在经营中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广泛吸收社员。并公推王彦升、万良才、陆春浦为理事，王彦升为第一任理事会主席。合作社开业后，主要以经销“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为主，兼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的部分读物及课本，推销代订《大众生活》、《新生》、《永生》、《世界知识》、《中学生》、《妇女生活》等各种刊物，并派送《小晨报》、《立报》。对“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征求预订，同时对鲁迅、茅盾、邹韬奋等人著作和“黎明书店”的各种出版物作了陈

列，兼做读者代办业务，代购代销各家书刊。由于他们是业余经营，营业时间有限，销售量不大，但在两年左右还发展了一百来个社员。除兰州大、中七校均有学生参加外，还有一部分小学教员、公职人员、工人等各阶层人士。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新书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仅仅利用业余时间营业，和维持当时规模，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因此，王彦升于一九三五年三月辞去了每月三十六块银元的银行职员职务，而专事办社，并先后聘请社员刘存诚、岳维峻、魏秉仁、于练祖、汪永正、颜东生、石桂林、万良才、王业荣、李耀增等人为社内工作人员。每人月薪法币二十元左右（低于当时小学教员的工资），并邀请贺进民、樊大畏、李湛民、李兆麟、李辑五、师让等社员，指导办社和利用业余时间帮忙协助。

有了专业办社人员后，除继续扩大书籍的购销业务，品种范围外，又和上海民族工业“三友实业社”、上海“合作批发部”、“华美烟草公司”等建立了供货关系，销售各种国产的日用百货，生活用品，包括自磨面粉、自制煤砖、各种烟卷、中成药等商品。

“同仁”初具规模后，在候府街小学（现张掖路兰州警备区院内）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通过了“同仁消费合作社章程”。章程规定了办社的宗旨目的，社员的权利义务，入社、退社手续，购物优待办法等条文。正式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又一次选举了理事五人，监事三人。理事有王彦升、陆春浦（银行职员）、廖子厚（小学教员）、王永年（小学教员）、万良才（社内工作人员），王彦升为理事会主席，主持社内工作。监事有孙友农（农民银行农贷主任兼合作委员会主任）、李慎修（银行职员）、雷恒闻（银行职员），孙友农为监事会主席。

在选举孙友农监事会主席的问题上，社员争论很大，认为“同仁”的领导层不应有国民党的官员参加，国民党推行所谓“合作运动”的性质是官办的，和“同仁”民营的消费合作有根本的区别。

“同仁”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般小职员，小学教师，大、中学生，邮电职工，个别医务人员，还有少数家庭妇女，失业青年和由这些人组成的工作人员。其目的是唤起社会觉醒，增长知识。摆脱官僚资本和商人的剥削，改善这一层人和城市平民的生活。而国民党的合作规范，指的是“生产合作”，只放贷款、收利息，所以群众把它叫作“合借社”。因此，“同仁”不应当受国民党政府的约束。而王彦升等人则认为：孙虽是合作指导委员会的主任，但当时思想表现进步，对“同仁”在组织和经济上都给过支持，让孙担任监事会主席，一方面可取得合法经营的目的，也可起到掩护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争取得到贷款。经解释后，大家才同意让孙挂个监事会主席名义。

这次会后，又在上海制作了社员证，并发给每个社员。

当时的兰州不到十万人口，在国民党和各种封建反动势力统治下，十分落后，交通不便（西兰公路三五年五月一日通车），消息闭塞。“同仁”的成立，是甘肃全省第一个消费合作组织，自然是一件了不起的新鲜事物。书籍商品，实行明码标价，打破了商人传统的经营方式——讨价还价的旧作风。比如书籍销售，当时书店都是按定价加成（加三到八成），“同仁”的出现，迫使其它书商不得不降低加价；而且由于“同仁”出售新书和进步书籍招徕了顾客，其他书店也在改变专售传统书籍的作法，增加代售新书。

三、“同仁”的鼎盛时期

“同仁”到这时，吸引了许多人前来买书参观，成天顾客盈

门，川流不息，一时名声大振。许多进步青年如魏立人、赵子明、鲜维俊、李尚忠、张生强、孙耀先、乔映怀、魏玉、薛志超、罗伟、苏振甲等人纷纷认股入社。这时万良才同志因参加社会活动被一中开除，返回原籍靖远县，办了一个和“同仁”性质相同的“同进消费合作社”，社员李甲中也在学院街（现武都路）办过一个“兴陇消费合作社”，社员段永泰在临洮县仿照“同仁”方式办起了“农民消费合作社”。由于“同仁”社向兰州女师推荐《妇女生活》杂志，她们也筹组开办“同行合作社”（由于校方干涉未得实现）。这时“同仁”的影响越来越大，声誉越来越高，在兰州市的书业界有举足轻重之势，有些书商甚至买去“同仁”的书刊，以原价销售，以招徕读者。

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同仁”的整个活动只是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表现了青年人好学上进，朝气蓬勃和勇于探求真理的特点。他们想用自己的行动，积极改变灾难深重的中国，改变封建落后的兰州；他们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朽和反动，想通过销售书报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救亡，做启蒙教育工作。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还抱有幻想，所以没有进行大的触动。如在这个时期中，“同仁”办过三期《合作生活》刊物，在刊物中还介绍过据说是合作事业的创始人法国学者季特的主张，并择译了季特有关“合作”的论述。季特有一句名言说“合作之于战争，犹如医生之于病人”，并在社内挂有季特的像片。营业室还挂有“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以示他们是“合作救国”的崇拜者。在社员证的扉页上也印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八个字，据说这是陈立夫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同仁”在这时仍处于探索、寻求之中，也是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四、“同仁”向革命方向发展

邹韬奋同志主持的“生活书店”和我们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内部不少人和所联系的作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当时宣传马列主义不能太公开，只能巧妙地进行宣传，如邹韬奋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中有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平心著的《社会科学研究法》、钱俊瑞著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柳湜著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文学》、《太白》、《光明》、《妇女生活》等各种刊物，其内容都是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思想的，对读者影响很大。“同仁”对这类书籍销售尤快。邵公文同志回忆说，当时“王彦升就一次一次的来信，添订这些书刊”。

“同仁”的左翼社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这些书刊，对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认识，思想觉悟在逐步提高，世界观在逐步改变。

三十年代，甘肃、兰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共甘宁青特委成立，并相继领导农民斗争、学生运动，开展游击战争，策动士兵起义；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红军长征先后路过甘肃，四方面军转战一条山和河西走廊；十二月北平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兰州七校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声援；一九三六年底又爆发了著名的“双十二”事变。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也深深触动了“同仁”社员的思想，向着革命的方向转变。

一九三六年二月，赵子明同志由党派来兰州工作，并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作掩护，在现酒泉路挂出了《益世报》分馆、

《大公报》分销处和《兴陇派报社》的牌子。通过订阅进步报纸刊物、购买日用消费品，很快和“同仁”建立了联系。为了通过“同仁”这个组织做宣传工作，赵子明和他一起工作的尹有年同志，立即认股入社，成为“同仁”最早的两个党员。一九三七年三月，王彦升受大家委托，去上海“生活书店”参观“取经”。由于以往长期的通讯联系和业务关系，王一到上海，即受到“生活书店”同人的热烈欢迎和殷切接待，让他住在店内，派人导游。王彦升利用这一机会和“生活书店”的青年同志邵公文、薛迪畅、薛天鹏、张季良等人多次长谈，进一步受到革命教育，并被各界人民炽热的抗日浪潮深深感染。他见许多青年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决心在返兰后即奔赴延安。他回来时又带来了一位“生活书店”的张朝同同志（到兰州改名高川之，原在上海工作，因从事革命活动，几被租界当局逮捕，并受到敌人监视）在兰州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王彦升于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兰州，七月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甘肃省工委”又重新组建，党的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在兰州掀起了高潮，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谢觉哉同志和“八办”的其他领导同志，对抗日救亡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谢老还亲自为“同仁”的骨干分子作报告，进行教育。部分同志还秘密到“八办”联系和党靠拢，从而使该社更加明确了宣传抗日救亡和传播马列主义的方向，工作更加活跃了。从三十七年开始，先后有工作人员万良才、刘存诚，社员李尚忠、薛志超、李辑五、李兆麟等同志，在兰州加入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六月张朝同同志随王彦升来兰后，住在社内，立即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表现非常活跃。但也引起敌人注